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龚自珍魏源

诗文选译

● 王俊义 曲弘梅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

王俊义 曲弘梅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陈大利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

王俊义 曲弘梅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鸷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龚自珍与魏源同是 19 世纪前期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性人物。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相同，年龄相若，思想趋向相近，相互间情谊也甚笃，因而时人与后人都将他们并称为“龚魏”。《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即是这两位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具有代表性的诗文选译的合集。为了使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龚、魏的诗文，现就二者所处的时代，各自的生平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略作评介。

一、19 世纪前期社会思潮的变化

19 世纪前期是中国社会历史与社会思潮发生转折和急剧变化的年代。这时，清代的“康乾盛世”已成过眼烟云，整个社会已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不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且处于海外殖民掠夺阶段的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在深刻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中，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又到了新的变化转折时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与之相伴随，社

会文化思潮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集中表现在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走向了衰落，而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逐渐兴起。乾嘉考据学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方面虽做出相当的贡献，但它只有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充足的养料而蓬勃生长，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当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历史进程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时，只能在古籍中讨生活的乾嘉考据学却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社会动荡的局面，而必然走向衰落。事实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便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管不问的考据学，已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障碍，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

在乾嘉考据学走向没落，学术风气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侧重于阐发儒家经书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逐渐活跃起来。自西汉就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羁束的学术派别，每援经议政，便于阐发经世匡时和进行变革的思想主张，常常是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家实行变革的哲学。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者是庄存与（1719—1788）。龚自珍曾高度评价庄存与“以学术自任，通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其后，清代今文经学一派的重要人物，如刘逢禄（1770—1829）、宋翔凤（1776—1860）等，大都和庄存与有师承关系或受其影响。刘逢禄与宋翔凤生活的年代，清朝的统治已到了危急时刻，他们企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虽然他们的本意还是要维系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挽救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

但能在乾嘉考据学走向没落的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鼓吹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却对鸦片战争前后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的进步思想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龚自珍与魏源都曾向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传》。特别是龚自珍对刘的学说非常推崇，他在诗中说：“从君烧尽鱼虫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也就是说要抛弃训诂考据之学，决心随从刘逢禄去致力于被人奚落为“卖饼家”的今文经世学。清代的今文经学，至龚、魏时期已具有明显的政治变革倾向。

在考据学没落和今文经学兴起的过程中，知识界的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学者和思想家，面对现实，敢于猛烈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朽，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留心时务，提倡经世致用，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诸如漕运、盐政、治河、土地、农政、货币、人口等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时的知识界，还比较重视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并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一些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和介绍世界情势的著述纷纷刊印。这与康雍乾以来，全国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交往日频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如姚莹在说明自己撰写《康輶纪行》的意图时就说：“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以便于“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些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①。”

由上可见，相对于 18 世纪考据学占支配的状况，19 世纪前

^① 姚莹：《东渚文后集》卷 8。

期的学术文化思潮，确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和变化，在转折变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经世致用思潮，涌现出一大批以经世为己任的学者和思想家，而龚自珍和魏源则是这批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杰出代表。

二、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璚人，号定庵，晚年又号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折过程中，开一代风气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

龚自珍出身于累代世宦簪缨的书香门第，其祖父是乾隆时进士，父亲为嘉庆时进士，又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其母亦工书能诗。他从童年始，即从父母习诵诗文，并从外祖父学习文字音韵之学，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史功底。自11岁起随父入京，寓居官衙，继而又随父亲的升迁调任，往来于冀、皖、浙、苏等地。就其个人性格而言，胸怀坦荡，放荡不羁。“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言语举动，“不依常格”，与人交往，不计身份，常常是“朝从屠沽游，夕拉骅卒饮”。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值社会变化转折时期。其去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他生活的五十年，正是封建社会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

龚自珍的上述身世经历、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的思想可能具有的特征：

其一，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教育，使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一生在诗歌、散文、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地理、释道典籍、科名掌故等方面，均有涉猎，甚或有高深造诣，且才华横溢，超出常人。他13岁即撰文《知觉辨》，“是文集之忙

始”，15岁有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并很快结集。23岁又写出一组惊世骇俗的议论文《明良论》。虽然家庭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但他那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时代的推动，却使他走上社会批判之路。他在鸦片战争前夕，便与林则徐、魏源等人共同倡导了抨击时弊、重视时务、抗御外侮的经世致用思潮。

其二，由于长期随父亲在京都及南北各地官衙，尔后他自己又长期在朝中冷署闲曹，使之深悉封建末世官场的内幕，即如他写的《明良论》，就针对嘉庆皇帝因天理教起义而颁布的推卸责任的《罪己诏》，及封建官僚集团的昏庸腐朽，尖锐指出专制君主视臣下如犬马，专制制度如同一根绳索，束缚着官吏的四肢，上自三台六卿，下至百官士大夫，“不能行一谋，专一事”，而都是些醉心利禄，谄媚君上，以犬马自为的寡廉鲜耻之徒，满朝之中，文恬武嬉，一旦国家有事，一个个像燕雀一样四处逃奔。对于专制皇帝及各级官僚的揭露，可谓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当其《明良论》一经问世，宛如在一潭死水中投进掀起波澜的警石，很快产生强烈的反响，一生专治考据的段玉裁读《明良论》后，也赞叹不已地说：“毫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悔矣！”

其三，由于龚自珍南北奔走，又广泛交接社会各阶层，使之有可能对当时社会有深切了解，能体察时代脉搏的跳动，关注现实与民间疾苦，加之他那敢于犯上的性格和风发泉涌的才华，使之能够以一位天才思想家对社会幽隐的洞察和对时代的总体感受，写出大量憾人心扉，发聩震聋的著作。他讲话撰文，都真情流露，不计利害，直抒胸臆，往往是“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涉

目皆是”，且“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①。”但这种叛逆的思想言论，都是时代的强音。特别是他的某些强调个性的思想和文字，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和胚胎”。

随着年龄的增长，龚自珍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在25岁前后，又陆续写出《乙丙之际著议》、《尊隐》、《平均篇》等文，也都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在北京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等人，与之学习今文经学《公羊春秋》，援引其中的微言大义，用考史论经的形式，阐发变革思想，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在此前后，他还研究边疆历史地理，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建议在新疆改设行省，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防止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

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38岁时，考中进士，在朝考《对策》及殿试《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从施政、用人、治水、戍边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主张，尤其是公然抨击八股为“无用之学”，使“阅卷诸公大惊”，遂不得入翰林，仅以内阁中书任用。此后，又连任各种小京官，始终不改初衷，上书直陈，昌昌大言，致使同僚讥笑他有“痼疾”，他每一上书，都使上司“动色以为难行。”而他依然我行我素，疾恶如仇，逆风而行。因被世俗视之为“狂士”，或直呼其“龚疯子”。

道光十八年（1839年）末，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禁烟，龚自珍积极支持林则徐南行，还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建议林则徐严惩破坏禁烟的敌对份子，做好反侵略的战争准

① 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备，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筹禁烟大计，因林则徐以“事势有难言者”，婉言谢绝，未能成行。由于龚自珍坚决支持禁烟斗争，又一直抨击时弊，不断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排挤打击，常遭罚俸，以致生计困窘，穷愁潦倒，爱国壮志未酬，导至抑郁闷积，“肺气横溢”，“呕血半升”。自忖继续在京都，亦难有所作为，于是决意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他轻装简从，只身出都。同年九月，又北上迎接眷属。在往返途中，他百感交集，赋诗抒怀，写下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

《己亥杂诗》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著述、师友交往、旅途见闻，一一写入诗中，既是作者的自传记录，又是时代生活的写照，渗透了诗人对国家命运、人民苦难的关注。如诗人南归至淮浦（今淮安）时，他看到拉纤的船夫艰难挣扎在航道上，遂以深切的同情心写下：“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看到东南地区的农民在苛重的赋税盘剥下，被迫卖掉耕地，四处流浪的情景，又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他在旅途中，仍深情怀念着林则徐，祝他将禁烟斗争进行到底，并为之出谋献策：“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龚自珍那首气势磅礴，回肠荡气的名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即出自《己亥杂诗》。

龚自珍南归后，执教于丹阳云阳书院，同时兼任紫阳书院讲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写信给驻防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拟辞去教职，赴沪共商抗英事宜。但时隔不久，却于八月

十二日（9月26日）暴死于丹阳。当中国历史步入近代门槛，时代正需要这位思想敏锐、才华卓越的思想家之际，而这颗明星却遽然殒落，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与龚自珍同时而稍后的诗人张维屏曾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龚自珍本人亦曾自述：“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过程中，龚自珍确是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三、经世务实首倡向西方学习的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邦达，字默深，又字默生，号良图。湖南邵阳人。15岁考中秀才，并做乡村塾师。20岁时，为湖南学政汤金钊赏识，被选为拔贡。嘉庆十九年（1814年），随父入京，途经水灾后的河南，目睹民不聊生，僵尸如麻的悲惨情景，曾写诗描述百姓的苦难：“明知梦花毒，急那择其他”，以至于“食鸠止饥渴，僵者如乱麻”的惨象，反映了其关注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情怀。

魏源在北京先后结识了龚自珍、林则徐、张际亮、姚莹等，相互间磋切学问，议论时政，并与龚自珍共同向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走向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道光二年（1822年），考中举人，后屡次会试落第。道光五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替贺编《皇朝经世文编》，这部书成为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反映了魏源本人的经世务实思想。在此期间，魏源还为江苏巡抚陶澍筹划海运、水利等实务，代苏州、松江知府编《江苏海运全案》、《道光丙戌海运记》。他本人还写了《筹海篇》等著作。

道光九年，魏源在北京考进士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廷贮藏典籍档案的所在，他在这里接触了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更加熟悉了清代历史掌故。约在此时，魏源还写了《诗古微》等今文经学著述，并编校了刘逢禄的遗著——《刘礼部遗书》，反映了其欲借助今文经学进行革新的思想倾向。道光十一年，魏源又在两江总督陶澍幕中，帮助陶澍改革淮北盐政。后在扬州购建了“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其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写成，因以古微堂名集。龚自珍曾为絜园题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概括反映了魏源的学术思想风貌。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应邀至宁波军中参加对英俘的审讯，并写成《英吉利小记》，记述了英国的政治、地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道光二十一年，与被罢官遣戍的林则徐在江口（今镇江）会晤。二人对榻通宵长谈，林将自己所辑的《四州志》交付魏源，嘱予续编。这年的下半年，魏源又在两江总督的幕府中参与戎机，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先后写作了《寰海》、《秋兴》等著名诗篇，抒发了其反抗侵略的爱国热情及反对投降派的愤慨。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魏源又于道光二十二年写成《圣武记》，书中既颂扬了清朝开国以来的武功，也揭露了晚清政治军事的腐败，并提出了如何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道光二十四年，他又不负林则徐的重托，在《四州志》的基础上，撰成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此后数年，又陆续扩充成六十卷、一百卷。这是魏源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的巨著。就是在这